

北京鋼院

本期四版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地址：北京北部 電話(27)441轉

1955年2月11日創刊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

1957.6.28.

90

星期五

我們的決心!

亲爱的党:

在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對我們是個嚴重的考驗。在前一時期，由於我們本身存在着弱點，政治嗅覺不夠靈敏，總是以好心腸去看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論。有些人是被它們所迷惑。可以說，我們過去是考得不够好的，但過去的已經過去，在未來的鬥爭中我們一定爭取考好。我們知道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是我們每個共青團員和青年的責任。我們熱烈地響應黨和團的號召，積極的投入到反右派的鬥爭中去，在這場實際的鬥爭中鍛鍊和提高自己。我們保證：

①向羅健敏同志學習，堅定立場，向右派展開堅決的鬥爭。

②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報告和其他文件，以武裝自己。

③無條件地服從黨和團的領導，嚴肅紀律，在反右派的鬥爭中鍛鍊和鞏固共青團支部的戰鬥力。

④不獲全勝，誓不收兵!

礦57.2班全體共青團員和同學

華僑堅決跟着共產黨走

印尼華僑 黃陽禮

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也使我憤慨。我是解放前回國的，在我的家鄉福建上學，親眼看到兩個社會，我願以我所看到的來反駁他們這些謬論。

解放前，海外的華僑被稱為“海外孤兒”，絲毫得不到本國政府任何保證，殖民統治者可以任意欺壓和殺害我們。華僑回國后就成為反

動政府的敲榨對象，保、甲長攤派糧餉，以華僑負擔最重。又由於當時物價高速上漲和貨幣貶值，使靠外匯為生活的僑眷更處於困苦的境遇，華僑學生經濟有困難就休想申請免費。我曾經因交不起伙食費而被趕出飯廳，當時因為年齡較小，又覺得人格受到侮辱而痛哭。

解放後怎樣呢？是更好呢？或更壞？我覺得是好，而且是很好。海外的華僑在毛主席英明的華僑政策光輝照耀下，“海外孤兒”已成了歷史名詞，華僑的正當利益得到了保證，隨着祖國的強大，外國人不但敢欺侮，而且日益尊重我們，我們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海外華僑也因祖國的建設成就而歡欣鼓舞，而感覺到驕傲。國內的華僑，由於僑匯得到法律的保障，任何人不能侵犯它，這樣使福建、廣東等地的僑鄉能在生活上得到保障，安居樂業，並建立了許多華僑農場，或組織了高級合作社，生活日益幸福和富裕。對華僑學生怎樣呢？國家不惜出了許多錢開辦華僑補習學校，以滿足年年增多的華僑學生在補習學校補課。對經濟有困難的，不但發給伙食費，同時還發給棉衣、棉被。剛剛解放（那時我還在福建），學校方面知道我經濟有困難就馬上發給我人民助學金。當時，我也掉下了眼淚，可是這次的眼淚是被幸福所感動的熱淚，而不是痛苦和悲傷。由於我們遠離自己的家、父母和兄弟，怕我們會思念親人，特在節日為我們舉行聯歡會，使我們能歡聚一堂，祖國對我們的關懷可說是無微不至。這難道是更壞嗎？

另外從華僑觀光團的觀感也許會更客觀地反映出一些情況，他們說：“僅在短短的幾年中，共產黨能將祖國建設得這樣好，象上海這種極混亂的城市，如今居然秩序这么好，沒有扒手，沒有乞丐，沒有娼妓，這使未親眼看到的人是難以相信的”。象鞍山、沈陽等地的工廠，其規模之大、數目之多以及設備的新式也引起他們的贊揚，特別引起僑胞感到興趣的是鷹廈鐵路的建成，他們說：“福建這樣的山

地，從來沒有一寸鐵路，只有現在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如此迅速完成這條鐵路的修築，國民黨只會向華僑騙錢，那會真正替人民辦事。”因此在全線通車時，築路的戰士們和民工們接到了許多遠從萬里飛來的慰問信和慰問品，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事實勝於雄辯”，我敢斷言，除了極少數的反動分子以外，絕大部分的華僑是很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當然缺點還是有的，所以黨才提出整風，我們應當從愛護黨的角度出發，積極向黨提意見，以便改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我們嚴厲警告右派分子，假如你們敢違反人民的意志，那麼國內外華僑決不會允許的，他們會同全國人民一道，團結在黨的周圍，擊退你們猖狂的進攻。

中國民主同盟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支部啓事

中國共產黨整風運動開始之後，有一批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借大鳴大放機會，發表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各種荒謬言論，並進行了一些活動，企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破壞黨與人民的團結，妄想把歷史的車輪往後拉，令人痛心觸目的是：在我們民主黨派中間，竟然也發現了那一些右派分子和那一類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為了辨明是非，堅定立場，我盟支部根據盟中央指示已開始整風，為了能使整風順利進行，希望我院全體老師、同學、職工同志們，對盟中央、支部以及盟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大力予以揭發並提出批評，意見請交教授宿舍208室。

中國民主同盟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支部1957年6月27日

詭辯和偽裝

秋明

評劉景芳教授在教職員工

批判右派言論大會上的發言

六月廿六日七時，由工會、學生會聯合召開了全校教職員工批判右派言論的大會。會上發言極為熱烈，都能實事求是地進行辯論，大膽爭鳴，這將有利於識別我們的右派言論並和它劃清思想界限。

所有發言的人（除劉景芳教授外）在爭辯中都涉及到了劉景芳教授的一些言論，對他的攻擊黨、醜化黨以及離間黨和羣眾的關係等的謬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由於羣眾要求他本人發言爭辯，得到了他的允許，但等到听完他的發言後，使我感到這簡直不是爭辯，而是詭辯，竭力把自己偽裝起來以混淆視聽，並且在借發言的機會又重新巧妙的攻擊黨以後，竟說什麼要做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了。現在就來分析一下他是怎樣詭辯和偽裝的。

開場白

他說：來開會是為了鍛鍊，我在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樸素的表達了我的意見，所見有限，絕對難免片面性……，應該不怕批評，應該聽得起重考驗等等。說到這里大家聽起來好像他心來聽取意見似的，但他馬上轉說：我的意見都是指一定的對象和一定的時間，有這些現象。這就是說，他的發言是在這一個地方，……可見並沒有說錯，沒有片面性了。接着是一系列的迷惑人的解釋。

詭辯家

他在發言中似是而非地解釋了很多問題，但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談根本問題，而是巧妙的在詭辯。在談到主張取消幹部班的時候，他說：當時認為學中學課可到中學去學，或另辦幹部學校……，現在知道錯了，因為幹部班已經在這里了。看！這就是他認錯的理由，這就是說：幹部班依然應該取消，只是因為已經在

這里了。既或如此，我要問，一再強調說自己怎樣想就怎樣說的劉景芳教授，為什麼在發言當時不說明幹部班應到中學去學的想法呢？而偏偏斬釘截鐵的說：“特權班”必須取消，下學期無人應教……的話，特別奇怪的是他又用使人難以理解的話，說什麼“我言行不一致”，雖說取消，但現在已準備下學期幹部班的課了，好一個詭辯家，難道誰不知道，黨不同意取消，你也只好準備。在他分析自己對黨員不夠格的比率的看法時又說：“這是我的想法，並且是問的口气”，接着便巧妙的說：有人曲解了問句為驚嘆句，看！他就這樣的似是而非避開了問題的實質，這使我想在另一些會上，他分析自己主張內行人治校時也用过同樣的手法，說什麼內行人治校的含义，除了教授、講師、助教外也包括內行幹部及其他，只是因為忘了一個“等”字，以致使人誤解，妙極了。一個字、一個附號，也成了劉教授創造性的運用，來為自己錯誤的政治觀點辯護。我不想再多舉了，他實在善於詭辯。

抓小辯子

劉景芳教授滿以為他的詭辯迷惑了人們的眼睛，于是在表白了自己忠心耿耿的在幫助黨整風以後，又採取抓領導小辯子的做法，閃爍其詞而又津津有味地大談領導的缺點，說三害就是醜的，硬要說美也不行……，企圖借口打擊黨的威信以爭取羣眾。也說：我校領導就是有些人不能聽取意見和羣眾共甘苦，而重名利……假如魏副院長在拿福利金時，能對徐文興說：你是否知道還有比我困難的，這就會影響很多人。又說：當給總務長送花時，如果說為啥給我送來呀，應該擺在辦公室（據了解並無此事），接着又說到人事採用問題，他說：假如真有在人員編制凍結後領導上又介紹了人，我看畫出來也不會好看。暫且不論首長拿福利金，送花和介紹人是否正確（據了解當時組織上以福利金1,800元分送給比較困難的一些領導幹部，包括院長、教授等），但我們了解，劉景芳教授談這些小事情時，還儼然以正人君子自居，好象只有自己懂得和羣眾共甘苦，並以訓斥的口吻向領導進上了肺腑之言，我感到他的

用意實在深長，這就是說：你們看呀！這幫主官集團，是腐化了，他們的三害已經不可救藥，但還硬說是美的，可是畫出來還是醜的，劉景芳教授以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去為自己辱罵黨，丑化領導做辯護，但就連小孩子也能夠識破你的小機何在。

耍花腔

劉景芳教授極力裝做明察事物的人，說教式的提出一些站不住腳的理由，避開了一些問題的實質，在說到“治校”問題時，他故意譏諷的說：“內行人”這三個字弄得事情大了！他借口大字報“反對內行人治校”為題，說什麼“如果擁護外行人治校那真不倫不類”，接着就以耳口手脚組成一個人來比喻自己“治校”的主張，說什麼並沒有不要黨的領導，而是更重視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就這樣半諷刺、半辱罵地把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制的政策和制度”偷偷抽掉了。在談到肅反問題時他除掉不敢正確回答出為何在自己發言中誇大的譏諷了四百多人，自殺多少、跌斷了多少條腿以外，以“洋大人”為題，說當時是指的學習態度而不是指的人，又說：這和舊社會的洋大人有本質不同。真奇怪，劉景芳教授稱蘇聯專家為“洋大人”也是對的了。因為是指的新社會的“洋大人”，怪不得他在前兩次發言中都肆無忌憚的把一切壞名詞都扣在共產黨身上，原來有了新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回答他的小孩說反動話的問題時，對於“要殺毛澤東”，“蘇聯和帝國主義一樣”等都避而不談，但他却着重的為孩子論證說：“西伯利亞的土地是包括中國的土地呀，帝俄時代是侵略了中國土地呀！”劉教授所以熟衷於這些話，好象擔心大家還不知道這樣的事，好象道出了劉教授的心音。他對於他所劃分的三類人的標準，竟辯解說：這是我認為可能領導心目中的看法，某一人或個人的看法就不相同，……而領導心目中的積極分子並不一定就是積極分子。請看吧，劉景芳教授就是這樣拐彎抹角來解釋他挑撥黨和羣眾的關係的反黨謬論。

(下轉第四版)

領導還是統治？一致還是對立？

看劉景芳對黨群關係的惡毒歪曲

楊耀東

劉景芳在他的幾次發言中，都緊緊抓住黨群關係這一問題，進行捏造、歪曲、醜化黨，污蔑黨，打擊積極分子，挑撥黨群關係，把黨和人民群众對立起來。

劉景芳挑撥黨群關係的手法，是把黨群對立起來，夸大個別黨員的缺點，然後推而廣之，全盤否定黨與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繫。把共產黨和人民群众的關係看作是統治與被統治，監視與被監視和互相對立的關係，這是劉景芳在黨群關係問題上的根本觀點，也就是他分析今天的黨群關係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劉景芳認為，在黨群關係上，國人皆曰有牆，這牆不是普通的牆，而是一堵無形的銅牆鐵壁。主宗官，“不但是官，而且是祖宗，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體”。這裡劉景芳不僅毫無根據地把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等字眼硬加之於共產黨，而且還把黨群隔離開來，黨就是黨，群眾就是群眾，沒有什麼利益的一致。為了論證這點，劉景芳就杜撰出了共產黨入城後，不少黨員城市化了，腐化了，把舊面目失去了，脫離群眾了，變成群眾的老爺了……的謊言。說什麼共產黨有自己的私利；吃得好，穿呢制服，帶子女坐汽車去聽戲，逛公園的，是共產黨人。說什麼“黨員在校決定一切一切，管理一切”。對鋼院的黨委盡了污蔑、謾罵之能事：說什麼“一堆外行把學校當作‘衙門’，來此上任作官，以期榮親蔭子，使自己的‘下屬’也分食一點勝利果實，沾點福氣。什麼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簡直成了你們‘循私、享樂’的幌子。”把黨描寫得昏庸、殘暴：說什麼黨把“頑強直言稱落后”，對“唯諾奉承者積極”；把“對敵人老一套工作方法和態度施諸‘人民’”。把黨委領導人的個別缺點盡量夸大，從而醜化他們，否定他們。說什麼鋼院有主宗官集團，而且是由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幹部們自覺形成的。如果黨委的領導人自覺地形成主宗官集團，那我們可以肯定，這黨委必然是變質、醜化了。劉景芳說黨委領導人自覺形成主宗官集團，這不過是較隱諱地企圖說鋼院的黨委已變質了。劉景芳用了許多刻薄的言詞來攻擊、辱罵黨委的領導人：例如罵魏院長希望別人干鬼鬼祟祟的事，魏院長非常自負，有私心，吹噓，獻媚奉承，內心別有企圖，營私舞弊，一心只想出人頭地，手並不干淨，心也够賤的……等等。冷嘲熱諷地說院領導某某的官相，嘴臉，某某是一足的“小官兒”作風，某某又是只坐在黨部請人去“朝拜”。可以說，劉景芳在這次整風中不是善意地在幫助黨委發現缺點，改進工作，而是在回憶着國民黨反動派的面貌，企圖把共產黨和國民黨說得差不多。雖然，他在發言中，曾幾次提到他是擁護黨、愛護黨、熱愛黨的，但從上面的種種事實里可以看出，擁護黨等等，都是假的，都只不過是一個騙人的幌子。

劉景芳在污蔑、醜化了黨以後，就在共產黨和人民群众的關係上歪曲事實了。這表現在：

1) 他夸大個別事實，說什麼“黨群互不信任”。說什麼群眾“在鋼院工作啥也聽不到”。我們知道，共產黨三十多年來和人民一起，依靠人民，推翻了三大敵人，以後又進一步地取得了今天的勝利。難道共產黨在對敵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都牢牢地依靠了人民群众，還能說共產黨不相信人民嗎？如果共產黨不相信劉景芳教授，還能讓劉先生在人民的大學里教書嗎？群眾路線是共產黨的基本路線，這是共產黨一再強調的，在黨綱中規定了的。如果共產黨不相信人民群众，那為什麼共產黨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為群眾服務呢？這次整風中，共產黨不也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才請非黨人士給黨提意見嗎？反過來，全中國絕大多數人，都以自己切身的經驗，認識到了共產黨是為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着想的黨，共產黨是要使而且也能够使新中國繁榮富強的黨。可以肯定，人民群众是相信共產黨的。劉景芳說，在鋼院工作啥也聽不到，這是假話。劉先生在發言中談到了鋼院的許多具體的事情（儘管有些是片面夸大的），但難道說，劉先生在鋼院就真的啥也沒有聽到嗎？劉先生說，院長有時不自覺地流出來的有些話才是真心話，難道院長平常說的話不是真心話嗎？請問劉先生，院長曾

在什麼問題上以假話來欺騙過你？劉先生說：“我們都應該把心掏出來，放在桌面上以心比心，以肝比肝。”我們要問劉先生，難道過去黨對群眾和群眾對黨，都不是講真心話的嗎？

2) 他說什麼鋼院是“祖宗官”在統治，目的是為了集團的私利；不讓群眾說話，“要求給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當面公開批評，而不要再暗地里偵察）。”我們都知道，鋼院歸高教部和冶金部領導，是按中央的方針、政策、制度辦事的。院首長不過是黨和國家在學校中的代表。難道說執行中央的政策，就是為了“集團”的私利嗎？新中國的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憲法中早已規定。劉先生在座談會上發表了三万多字的言論，院刊也及時登載了，難道還說共產黨沒有給劉先生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嗎？劉先生要求黨今後不要再暗地里偵察，這正說明劉先生心里是鬼鬼祟祟的。正大光明的公民，就沒有怕別人的所謂偵察的。大家也知道，劉先生用“偵察”二字，是在中傷黨的成員向自己的組織匯報情況的規定。事情很清楚，黨要聯繫群眾並了解群眾的情況，就必須通過自己的成員。黨的成員向自己的組織匯報自己所接觸的群眾的情況，絲毫也沒有“偵察”“監視”的意思。黨組織只有在更好地了解了群眾的情況後，才能更好地組織、動員人民群众去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

劉景芳對黨委領導同志批評乎？醜化乎？

——讀劉景芳五月卅一日發言

明理

(一)

首先，劉先生看來，黨委在鋼院的領導，實際上是以私利為目的的“主宗官”集團在自覺地實行殘暴的封建統治，而黨委和行政領導人魏景昌同志則是集團的首腦。他說：

“鋼院的主宗官集團是由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幹部們自覺形成的。”

“一堆外行人把學校當作‘衙門’，來此上任作官，以期榮親蔭子，使自己的‘下屬’也分食一點勝利果實，沾點福氣。什麼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簡直成了你們‘循私、享樂’的幌子。”

“這類黨員領導者似乎是在那兒這樣想，……我認為黨員們的封建殘暴統治思想就是這樣產生的。”

從這一根本看法出發，繼之就是對魏景昌同志加以一連串醜化的詞句：如“喜歡別人奉承”，要教授拋棄“自尊心”，要教授作“鬼鬼祟祟的事”，“有私心”，“在吹噓”，“官官相護，互相包庇”，“等級觀點十分濃厚”，“搞小圈子”。至於治校方面，則是“盲目辦學”，“僅聽若干黨員的匯報，而不接近群眾，不依靠群眾”，“粉飾太平，矇蔽上級，滿足現狀，目光短淺”，因而“內心別有企圖”。這还不够味，最後又來個“喜歡別人奉承，偏聽片面消息，不走群眾路線，作事不足踏實地。驕傲自滿兼自私，拒忠言于千里，引魍魎為知己，自吹自擂，自己在那兒欣賞‘個人享受’，營私舞弊，一心只為出人頭地”。從而說明了“你的心是够賤的”。他甚而把肅反運動也說是“‘祖宗官’的領導者想借此機會把他們認為‘不順眼’的人來個一打光，……以便穩固的當官”；把魏院長對蘇聯專家的態度，說是“獻媚奉承”和“往日的崇拜‘洋大人’毫無二致”。

(二)

這分明是對黨委領導同志故意的尽情醜化，不必多說。即拿他所謂“喜歡別人奉承”，要教授作“鬼鬼祟祟的事”來看，據他另一次發言所說，實際上不過是院長某次對他說，希望他多反映一些教授的意見。而他却認為是要他當什麼“神耳報”。請設想：如果有同學來向老師反映同學學習情況，老師順便請他們以後多反映一些，這不是合情合理，光明正大的嗎？何來“鬼鬼祟祟”，“喜

3) 他打擊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把群眾中在工作學習上都積極的人恥笑為“吹拍奉承，看風頭行事者”。劉先生如此這般地譏諷、打擊積極分子，其目的無非是要群眾不去接近黨，使黨在群眾中孤立。這又是劉先生在明顯地企圖破壞黨群間的密切關係的一例！其手段是狡猾的，用心是狠毒的！

劉景芳在高級知識分子有高度的自尊心，可殺而不可辱等詞句掩飾下，詛咒鋼院的教育是“取消自尊心”的教育，認為鋼院“只能培養一堆搖旗吶喊的嘍囉，至高也不過培養一些只能輔助別人作皇帝的‘亂臣賊子’，却難以培養出能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的主人’”。劉景芳對院黨委抱有明顯的對立情緒，認為和院長接近，就是“取消他的自尊心”。劉景芳真是沒有違背他的“祖宗官”的理論，在實際行動中把院長看作是過去舊社會的官僚，一接觸就要取消自己的自尊心。這是劉景芳把黨群關係看作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的一例！

4) 劉景芳在黨群關係上散佈可懼的氣氛，說什麼黨委“對那些愛說話，愛批評的人”，“恨之入骨”，“總要抓個機會用悶棍亂打他一起；整他個一命嗚呼！”

劉景芳說這番話的用意，是在有意污蔑黨，是在企圖叫群眾不要給黨提意見。

“鋼院的黨群關係不但不正常，而且相當惡劣”——這就是劉景芳給鋼院黨群關係所下的斷語。而這種“惡劣的”情況是由黨委領導者的小集團“自覺形成的”。按劉景芳的這種說法，其邏輯上的必然結論即是：要掃除自覺形成的“祖宗官”小集團，就需要使現在的黨委下台。

從以上材料和極其粗略的分析看來，劉景芳的歪曲和挑撥黨群關係，無疑是別有用心！

奉承”？！劉先生一面說魏院長“不走群眾路線”，“僅聽黨員的匯報”，而對於院長請他多反映情況，又認為要他作“鬼鬼祟祟的事”，難道這是認真地在作批評嗎？

依照劉先生上述醜化的樣子，在魏院長和黨委領導下，鋼院非一團糟不可，難怪他把“成績是主要的”，說成是“流行公式”、“黨八股”。但是，誰都看得見，建校以來，基本建設、教學改革和培養學生任務是基本完成了；教學水平與學生質量是逐年提高了；糧食供應政策、增產節約政策、肅反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和學習蘇聯等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我們也基本上正確貫徹了；難道這些不是成績嗎？不是在院長和黨委領導下取得的嗎？難道這些也是什麼“幌子”嗎？

依照劉先生上述醜化的樣子，則我院黨委領導就不是某些作風的問題，而是根本思想、品質問題，根本就糟得很，沒有領導的資格，這不是有點象“中央毛主席好，下面干部糟”的某些人的“流行公式”嗎？如果上級不把黨委領導撤換，豈不是國務院乃至黨中央也“官官相護，互相包庇”了嗎？

(三)

魏院長和其他黨委領導同志一樣，是有缺點的，而且我們對他的要求也應更加嚴格，因而在整風運動中須全院同志認真嚴肅和實事求是的提出批評，批評不怕尖酸，當然也可能不夠確切，但這與故意醜化有本質的差別！劉先生在本院多年，情況了解的確不少，同時他又說“自問對黨忠心耿耿”要以“同是一家人”的態度，本着“明辨是非”、“加強團結”的精神來幫助黨整風，但是他卻對黨委領導同志盡量醜化，這是怎麼回事呢？

火把和炸彈

健談

最近，右派分子趁我黨“整風”運動之機，高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的“火把”，到處放火，造謠煽惑，企圖混水摸魚，火中取栗。不少同學已經被這“火把”的瑰麗之色、炫人之光耀得頭暈目眩了，他們一時喪失了辨明是非的能力，有些不自覺地有了有色火把的一絲火舌。不少同學不覺人民日報的社論大有意見，他們懷疑這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會阻塞言路、是否會阻礙爭鳴；甚至有的同學不自覺地充當了右派分子的“助手”，到人民日報進行“訪問”。

北京醫學院的炸藥的火光，硝煙的烈味，給我們鳴出了階級鬥爭的警號，也給這些人敲起了警鐘，注射了清醒劑，他們這時大概該“恍然大悟”了吧！炸藥的火光是卑劣和醜惡的，絕不瑰麗，只會“驚人”，但它也是一種“火把”！

讀趙錫霖同志的發言

民盟盟員 張郁明

為了維護中國民主同盟的政治綱領：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據民盟中央確定盟內整風的主要內容：整掉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思想和行動；現在，我想以一個盟員的身份，對趙錫霖同志在本院五月廿三號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提出幾點質疑和意見。

首先，我對趙錫霖同志的發言，在提到“鋼院民盟黨派”一小節中所說：“鋼院民盟受到黨員宗派主義很大影響。對我來說，鋼院民盟象是‘聽話’訓練所。有的組織生活，是宗派加教條，大家念念經，給黨委負責統戰的傅君詔同志聽”……等語。提出下列問題和意見：

第一、我不知道趙錫霖同志所談：“鋼院民盟受到黨員的宗派主義很大的影響”。究竟所指為何？有何根據？我認為：趙錫霖同志如果把有的黨員同志（是民盟的盟員，也是中共的黨員），為了愛護和幫助趙錫霖同志能更好的進步，而對趙錫霖同志在在某些方面提出某些批評或意見；或者是把黨委的個別同志為了使鋼院民盟支部的工作，能更好的在黨的領導之下，正確的貫徹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推動所有盟員和所聯系的群眾，為建設社會主義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而提出了某些意見，就看成是黨員甚至認為是黨的組織的宗派主義的話，那麼，我覺得趙錫霖同志的這種思想，實質是在敵視黨員甚至是在反對黨的領導，是與章伯鈞及儲安平等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無異。這是與盟章盟綱相違背的。

第二、我對“對我來說，鋼院民盟象是‘聽話’訓練所”的這種看法，也是有很大意見的。在這裡，我覺得應該分辨清楚的是：趙錫霖同志所指的“聽話”訓練所，是指聽誰的話及是誰的訓練所的問題呢？在这一点上，趙錫霖同志已指得很明白，因為他接着就說：“有的組織生活是宗派加教條，大家念念經，給黨委負責統戰的傅君詔同志聽。我到鋼院以後，看到不對的事，往往不加思索，常提意見，發牢騷，影響很壞”。這就不難使人知道：趙錫霖同志所指鋼院民盟就是共產黨的“聽話”訓練所，以及趙錫霖同志本人對這一點是非常反對的。根據盟章盟綱的規定：“本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本盟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動員本盟盟員和所聯系的群眾，努力宣傳和貫徹國家的政策、法律、法令，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我覺得鋼院民盟的組織，不僅應該承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應該積極地、更多地爭取本院黨委的領導，更好地發揮其助手作用，為正確地貫徹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而努力才對。而今天，鋼院民盟支部的工作，在尊重與爭取黨的領導這方面，是極其不夠的，甚至可以說有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當然，這是與身為民盟鋼院支部負責人的趙錫霖同志的這種對抗黨的領導的思想感情有密切關係的。我不知道趙錫霖同志的思想深處，究竟有何打算？是不是趙錫霖同志也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的看法和想法有上呼下應的聯繫呢？

第三、趙錫霖同志說：“有的組織生活是宗派加教條；大家念念經，給黨委負責統戰的傅君詔同志聽”。我覺得，如果趙錫霖同志所指的是整個民盟支部和每個盟員的話，顯然是一種與事實不符合的污蔑，但如是坦白暴露其本人的思想實質的話，那麼，也許是與事實相符的。因為根據趙錫霖同志的發言，不難看出其對黨的領導，牢騷滿腹，心懷不滿的情緒是非常嚴重的。而在組織生活中，由於很多同志在座，如果發表其謬論，必然會遭到同志們的尖銳批評，為了保持其個人的“尊嚴”，只好來它一套口是心非的、理論脫離實際的“宗派加教條”，拿着某些文件（如民盟北京市委的某些指示）象念經似地念它一通，應付門面，或者說是在念給傅君詔同志聽的。

其次，趙錫霖同志說：民盟“在發展盟員方面，也受到黨的宗派影響”。這一點也是我不能同意的。根據民盟北京市委在今年一月廿八日所編印出版的“北京盟訊”關於組織工作的一般情況的報導：在發展和壯大盟的隊伍方面，到現在為止，盟員總人數達2108人，約佔全國盟員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強，比1949年北京盟員總人數增加了將近六倍，盟員中除了一小部分是解放以前參加的以外，其中大部分都是歷次政治運動中加入的。我們可以从以下數

字中清楚的看到這一點。例如1949年發展盟員84人，1950年112人，1951年425人，1952年357人，1951年1952年盟在發展工作中達到了最高峯……”。事實證明：解放以前，由於受國民黨的限制及迫害，盟的組織活動會一度被宣佈為非法而被解散，更談不到什麼發展，而解放以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盟的隊伍，不僅得到了大大的發展與壯大，同時還獲得了中共多方面的關懷與支持。特別是1951年和1952年在全國範圍以內盟在發展工作中其所以能達到了最高峯，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在黨的大力支持下與具體幫助之下才獲得的。鋼院民盟的發展工作，當然也不會例外，事實證明鋼院支部在最近一二年內也吸收了一些較好的同志入盟的。因此，我不知道趙錫霖同志所說：“在發展盟員方面，也受到黨的宗派影響”這話究竟有何根據？是不是趙錫霖同志也和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同樣有抗拒共產黨的領導，有與共產黨平分秋色，想以民盟的組織作為其個人的政治資本，恨不得使民盟在很短期間以內，不論其是否需要與條件的是否成熟與可能，大大的發展一批盟員，作為自己的墊腳石，以滿足其個人的某些慾望的思想。所以反過來說“也受到黨的宗派影響”呢？

再其次，趙錫霖同志說：“有的盟員，大家不願接近，怕‘匯報’。‘匯報’背後談論人，實在令人討厭”。這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觀點。因為從趙錫霖同志的整個發言來說，言下之意，很明顯的就是他是反對個別同志向黨委去匯報某些情況的。我認為，作為一個盟員來說，為了能更好地發揮中共黨的助手的作用，為了能正確地貫徹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使大家都能在黨的正確領導與教育之下，更好地發揮其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某些情況及時向黨匯報，或者就及時反映給黨，使黨能更全面地在了解實際情況的基礎上，能較好的教育和幫助同志們解決所存在的一些問題，這完全是應該的，是一個盟員應有的責任。而趙錫霖同志身為鋼院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竟對厭和反對別的同志向黨彙報，這顯然也是違反盟章盟綱，不是熱誠為黨的助手，而是熱誠為黨的对手，反對黨的領導。這對鋼院民盟支部工作的損害姑且不論，單就這種思想感情來說，也是值得趙錫霖同志深入檢查的。

以上是我對趙錫霖同志發言中在“鋼院的民盟黨派”一節內所提到的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意見。這些看法和意見，我認為是值得趙錫霖同志深入檢查和一思、二思、三思再思的！同時在深入檢查思想實質的基礎上，好好的分析一下下列問題：例如說：“為何‘積極分子’現在消極？對鳴放厭煩？為什麼歌功頌德，獲益非淺的，還在幫腔作勢？”……高級知識分子也能聞弦歌而知雅意。只有推心置腹，才能視為人，現在是“掏心”的時候了！“高等學校，應該是講道德、學問、文化、修養、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三害’辦事處，升官發財，欺上瞞下，吹牛拍馬，要把戲，弄手段，投機取巧，販賣學問的地方。看看別的学校高等學校啥樣，我們啥樣，令人痛心，墨子曰：‘入國不見其士，則國亡矣。’我們入院不見其士，則院亡矣。”……以及對同學們說什麼，有很多教師都想離開鋼院……等話，自己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以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在對待黨的領導？弦外之音，言下之意，究竟是為了什麼？

最後，在這裡，我覺得我應該特別提出的，就是我希望趙錫霖同志能夠在這次整風中，老實地、深入地勇敢地檢查、分析、批判自己的言行，究竟是什麼東西？不希望再看到趙錫霖同志的無動于衷的口頭上的承認錯誤，說什麼：“……經過同志們的幫助，我已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過去我反對‘歌功頌德’，今後我也要‘歌德’”……等等，而在若干時期以後，又來上一套說什麼：“在盟內經同志幫助，的確很好。以後不提意見，不說話，反而說我有進步，令人哭笑不得。”等等的把戲！

“鋼院是集中營”？

俄文教研組 一鳴

在俄文教研組鳴放會上，陳德滋先生說：“鋼院是集中營”。陳先生又說：“黨喜歡奴隸，不喜歡別人提意見。”按照陳先生的邏

輯，鋼院除了“奴隸”以外，皆囚禁于“集中營”中了。看陳德滋先生是怎樣污蔑我們集体的，不知道他的用心何在！想錯了，陳先生，三歲孩子也會知道，關在今天的“集中營”中的是反革命分子和違法分子，而不是愛國、愛黨的人民。如果你感到是被囚禁在“集中營”中，那麼，這是為什麼？你的身分怎樣！？

我們每個人都深深地体会到生活在今天是自由的，幸福的。但陳先生却不然，她說：“生活在恐怖之中，不如早結束這醜惡的一生”。不知陳先生的“恐怖”是指何而言？也許陳先生會巧妙地解釋這“恐怖”一詞，人們總看得清這是什麼意思。至於“醜惡的一生”，那我們更不知道是指什麼，有些不好表示意見，只有陳先生自己知道他的底細——“醜惡的一生”了！

陳先生口口聲聲地說：“毛主席領導是對的”，但是接着又說：“來到鋼院就變質，一到下邊就完了”。無疑這是否定鋼院的黨組織，否定一切“下邊”的黨組織。

她還說：“毛主席真英明，再不整就不象話了，推翻一個統治（指國民黨），又建立一個統治（指共產黨），這個統治更厲害”。結論不言而喻，當然是共產黨不如國民黨，現在不如過去了。不知道陳先生站在什麼立場上說這些話。

通過這次學習，人們能夠清楚地辨別：誰是善意地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誰是借口大鳴大放來散佈荒謬的反動言論的。

同志們：我們要擦亮眼睛，提高政治嗅覺，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向反社會主義言論進行無情地鬥爭。

更正：本刊77期王桂興的“對整風運動中的團委工作提些意見”一文中，（1）“為什麼團委過去對我們不了解”一句中，漏掉了“們”字。（2）“有助於擴大‘民主氣氛的民辦社團刊物’”一句中，漏排了“擴”字。

（上接第一版）

護身符

劉景芳教授在整個發言中一再強調我就是怎樣想的就怎樣說出來，好象自己洋洋數千言的辱罵黨，辱罵人民群众的發言是言無准備又無意識的，只是感到當時心中不太好過。他極力抓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几句话，企圖以此作為自己的“護身符”。又說：高院長号召不怕尖銳，所以也就無顧慮的講出了心里話。言下之意，大有悔不當初之感，好象上了共產黨的圈套了。好雄辯的口才！我們要大喝一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不能適用於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右派分子。對於任何意見不管正確與否，只要是誠心幫助黨整風，都應該受到歡迎和鼓勵。但對於借黨整風的機會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大人先生們，則應嚴加駁斥。共產黨虛懷若谷，氣吞山河，勇于接受批評改正錯誤；但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為了對人民負責則必須取締，禁止亂說亂動。可是在這裡，劉景芳教授竟挖空心思企圖以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為自己的反動言論做“護身符”。企圖阻擋人們對他的反動言論的批判和駁斥。如果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要上他的當。

偽裝

劉景芳教授在結束自己發言的末尾，裝做滿腔熱忱的說：“此生不能入共產黨，也要做個黨外的布尔什維克”，就這樣來大言不慚的向群眾發誓。可是，人們要問：已經有70~80%的黨員腐化了的黨，並且是封建官僚和家長統治的合一體，素稱大丈夫氣魄的劉教授如何想參加這樣的黨？在大量散佈一系列的反黨言論而又曾表白要到深山里修身養性的劉景芳教授又何以能做黨外的布尔什維克。曾表白自己追隨黨30年又衷心擁護黨的劉景芳教授，對於把一切辱罵封建王朝，官僚政客的壞名詞都一股腦兒扣在共產黨身上。又該如何解釋？素稱自己是自尊心的知識分子的劉景芳教授，不但挑撥了黨和人民群众的關係，同時暗地里辱罵我黨的黨外人士（教務長和幾位系主任）為趨炎赴勢，靠拍馬逢迎而登上寶座的人又如何解釋？一切一切都如何解釋？我的天哪！好一個黨外的布尔什維克，如果魯迅先生在九泉之下聽到這句話時，我想，他會為劉景芳教授感到羞慚的。

“認識錯誤”“偏激”乎？反黨反社會主義乎？

鋼四 楊志民

儲安平發言的實質

儲安平的真實嘴臉以及他與章伯鈞等右派頭子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最近報紙上所登各有關方面人士所揭發的材料中，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一直到今天，一些人還認為儲安平的發言只不過是“認識錯誤”或失之于“偏激”，甚至覺得某些地方還是對的。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他的發言。

標題：（這是他不許記者更改的） “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現象：“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頭才算數”；“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付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付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付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

原因：“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結論：“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身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清楚地懂得，在今天，黨的威信是這樣高，解放八年來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是如此堅定，要是公開地提出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是沒有任何市場的，所以，在這篇發言中，他竭盡迂迴曲折之能事，用了不少什麼“知識分子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啦；“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願跟着黨走”啦！什麼“我們都願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等等偽善的詞句，（正是這些漂亮的詞句和似乎純客觀的語氣，迷惑了一些人的視聽），但其實質却不外說：“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黨天下的思想，共產黨是宗派主義的黨，要想反掉宗派主義，只有反掉共產黨”，或者如陳新桂所替他引伸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三大主義的根源”，因而要廢除三大主義，必須剷除無產階級專政。這豈不是在“助黨整風”外衣下反黨的惡毒冷箭——實質如此，豈有他哉！

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黨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是引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列車的火車頭。“應該認識，幫助黨整風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以整風是為了整掉官僚主義，而不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是為了整掉宗派主義，而不是為了削弱黨在全國人民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核心領導作用；是為了整掉主觀主義，而不是為了修正主義代替馬列主義”。（見六月廿日人民日報千家駒等“為什麼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事實上，一切愛國的願意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正是這樣理解和參加整風運動的。但儲安平的發言卻與整風目的完全背道而馳，他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掛羊頭賣狗肉，對運動起了極其有害的作用。（當然，對他本身來講，目的暫時是達到了。君不見香港蔣介石集團的報紙已在為他喝彩鼓掌了嗎？君不見“大將”章伯鈞已夸獎他對共產黨“击中要害”，並且斷言儲安平將和胡風一道成為“真正的歷史人物”了麼？）

儲安平的發言是毒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首先表現在他肆意的歪曲事實，把事情故意說成似乎真的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頭才行”，他有意把黨與各民主黨派，廣大人民對立起來，人們不難從儲安平的發言中想象出這樣一幅圖畫：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組織和黨員都是高高在上，獨斷獨行，而各民主黨派及廣大人民則只是活傀儡或當今的阿斗；掌握人民命運的不是人民自己，而是當領導的黨員；不是人民對反動派專政，而是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和勞動人民專政了。在這裡，儲安平撒下迷天大謊的狠毒用意，不是極其明顯的嗎？這裡那能夠嗅到一點他口口聲聲所宣稱的“擁護黨的領導”的氣味？他象煞有介

事地說：“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作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他利用在整風中所揭發出來的一些事實，陰險的挑撥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之間的關係，妄想使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對共產黨不滿，使他們與黨离心離德，使被整掉的不是黨的“三害”，而是共產黨。儲安平的用心良苦矣！其次他隱晦但惡毒地污蔑黨中央——具體的指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思想，說黨是一個宗派主義的黨，說：‘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從而造成要整掉宗派主義，就必須整掉黨的印像。事實勝於詭辯，就讓我們從事實來鑑定一下儲安平的發言吧！儲安平不會不知道，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已把統一戰線總結成爲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之一，光明日報編輯先生應該比我們這些“子子小民”了解得更清楚，政協中的代表人物解放後是不是年復一年的增加，代表面是不是年復一年更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多少個民主黨派的代表，其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黨的工作，人民會不會選他們？我們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多少個非黨人士的付委員長？在國務院的部長、付部長以及司、局長等高級幹部中，有多少非黨人士在任職？在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部門中有多少黨外人士在擔任高級領導？各民主黨派的組織解放後都有了不止几十倍的發展，除了各民主黨派自身的工作外，是誰在幫助和支持他們？“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誰提出來的？而作爲一個

究竟右在那兒

施恩、祖賢、太源、清東（施恩執筆）

一、初次的感覺

初讀儲安平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給我們第一個感覺是：儲根本談不上右，當然也談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了。理由是：第一，儲總是“據我看來”“我認爲”“向毛主席周總理請教”等商討的口吻，是“提些意見”的精神。而且口口聲聲是“知識分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凭什么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呢？這些言論第二，“黨天下”“清一色”在生活中是不是沒有呢？毛主席在1942年就說過“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不信可找毛澤東選集847頁）。劉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就說“至今還有一部份共產黨員抱着一種‘清一色’的觀點，他們不願意黨外人士參加國家機關的工作，或者有不同黨外人士商量，不尊重黨外人士的職權”就是在我們學校里也有“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的現象。至於十二個副總理中加一兩個非黨人士也未嘗不可嘛，為什麼說別人是“右”呢。第三，退一步想，儲把“黨天下”“清一色”過分夸大，因為“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一個黨員做頭兒”與事實不符吧，（因為儲自己就是光明日報的頭兒），這不過是說錯了，難道能把錯誤的言論都歸進“右”里去嗎？

二、關鍵在那兒

“同樣的一件事，為什麼有些大學生和有些大學教授是一種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種看法”？這確是個驚人的問題，工人們的明確態度，使我們不能滿足於初次的感覺，必須深入討論。關鍵在那兒？這就是儲安平說的“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他認爲“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與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而毛主席說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就是說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是宗派主義的根源。

同樣的一件事，又有了兩種結論，究竟是誰對了呢？還是大家都對呢？這不得不使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

三、“右”在那兒

按毛主席的說法，要克服宗派主義只要有成效地克服主觀主義，這便要求有系統地努力來提高我們的馬列主義水平，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應大大加強對於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及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擴大黨內民主等等，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同意毛主席的說法，（這不能算是教條主義吧）。

執政黨，當黨內整風時，敢於發動全國人民來給自己提意見的又是誰？……事實表明，黨中央沒有“黨天下”的思想，共產黨不是宗派主義的政黨。對於一個相信歷史是群眾創造的馬列主義政黨來說，也不可能是宗派主義的黨。解放幾年來翻天覆地變化和國家各方面建設的巨大成就，正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勞動人民忘我勞動的結果。怎麼能夠設想一個有“黨天下”思想宗派主義的政黨能夠團結廣大人民得到如此輝煌的成就嗎？儲安平在這裡一手遮天的惡毒污蔑的真實目的，只不過是要取消黨的領導罷了。誠然，一些黨員或一些黨的組織是存在着宗派主義情緒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但難道不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才發動整風么？這種現象與黨的指導思想是不相容的。人們完全相信，經過整風運動，宗派主義現象將大大減少，將更好的團結全國人民一道前進，第三、他扮着悲天憫人的面孔，假惺惺地說：“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爲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黨群關係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我們不知道儲安平從那裏掌握的料材知道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儲安平似乎忘記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突出從何時開始的，他好象也根本不懂得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麼矛盾。而這和某些人所大喊大叫的“共產黨和群眾關係惡化了”“群眾要殺共產黨”等反動言論正是互相呼應，有異曲同工之妙。

難道這一切都只是“認識錯誤”或“失之于偏激”？難道這些就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難道這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是時候了。撕開他們的假面具，讓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畢露吧！為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決地反擊這些反動的言論。

按儲安平的說法，要克服宗派主義只有消滅“黨天下”的思想，這便要求重新改組目前的民主聯合政府——人民政府，讓他們也做總理，不要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讓大家都來共治天下，即平分秋色。

從以上二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來看，“黨天下”的思想是不等於主觀主義，當然是儲安平錯了，但為什麼又是右派分子呢？這就要進一步看看儲的“黨天下”思想究竟指的什麼。

少奇同志所指的某些同志的“清一色”觀點及我們所理解的“黨天下”是不健康的宗派主義所形成的，這是我們黨的缺點。而儲却相反，他認爲“黨天下”的思想形成了宗派主義。可見他說的“黨天下”“清一色”與我們說的“黨天下”“清一色”的缺點是有着不同含意的，他這樣泛泛地向毛主席周總理所提的“黨天下”思想，實際上是指黨在全國範圍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是指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儲安平的言實際上是：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指導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可見他所理解的宗派主義與我們理解的也不相同，他的宗派主義是指黨在全國佔有的絕對領導地位。

其實他是自己學說的不徹底的改良主義者，因為想換一、二個總理之後，怎能解決“黨天下”的思想問題呢？思想問題應從思想上來解決呀！所以他還只是“提些意見”罷了，還有改變黨的領導思想等意見還沒有提呢。

已經很明顯，我們反對宗派主義是嫌它馬列主義太少，而儲反對宗派主義是嫌我們馬列主義本來就不應該有，不要黨的領導，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他把黨的天下與人民的天下對立起來，這當然是立場問題，是右傾思想，他是右派分子。

四、一些感受

通過這次討論，我們有下面幾點感想：

1. 工人的話說對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結論，帶有極大程度的直觀性。那樣一針見血，直截了當地擊中了儲之流的要害。他們其中有不少人沒有系統地學過中國革命史，聯共黨史和政治經濟學，為什麼會那樣眼明手快呢？我們認爲，這是由於工人們在理性上及感性上與共產黨骨肉相連，任何不利於黨的言論和行動，會象電一樣接觸到工人們的心靈深處，這就是政治敏感性。

2. 我們有問題。看看工人，再想想自己，確是一個顯明的對照。我們學過不少政治課，且讀過不少著作，但遇到一個具體問題時，推理了半天才得出一個結論，這種反映的遲鈍決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我們無論在理性上和感性上與黨的一切沒有緊緊連在一起，思想感情與工人們溶成一体還差，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地改造自己，要向工人學習，從而提高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性。